

# 馬克思主義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在師資教育的啓示

姜添輝

由於大部分教師忽視社會文化對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致使教育結果的不均等現象被合理化。改善此種現象需求寬廣的文化視野與批判思維，然而大部分教師被指責欠缺此種素養，他們展現工具理性的思維與技術效能的行為。本文試圖追溯此種現象的鉅觀面成因，文中分析顯示此種現象根源於社會的價值體系，當科學技術在生產體系取得主導地位時，實證科學的屬性逐漸轉變為個體與外界互動的依據，甚至被融入社會價值體系中。此種情境使師資培育課程產生科學化，其焦點是實務運用以及技術效能導向，致使大部分教師將教育目標、教學內容、過程與結果化約為技術效能層面。

關鍵字：馬克思主義、工具理性、師資教育

作者現職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 壹、前言

社會學者已普遍證實教育結果的不公平現象。具體而言，家庭社經背景明顯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相較於勞工階級學童，中上階級學童往往有更優秀的學業成績表現（馬信行，1997；陳麗如，2003；駱明慶，2002；謝孟穎，2002；Goldthorpe and Breen, 1999）。此種現象根源於多重糾結的複雜因素，其中學習者的先備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與課程內容的知識結構實居於關鍵地位。前者往往是延續主要撫育者（一般而言是父母）的結果，這牽涉家長職業形成不同的價值觀與教育成就期望（楊瑩，1994；Ball, Bowe and Gewirtz, 1997），經濟條件形成的文化刺激形式與量（林湘慧，2003；陳珊華，2004；Bernstein, 1990, 1996；Bourdieu, 1993；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教育方法導引出的親子間語言互動模式（Bernstein, 1961；Wells, 1985, 1987），以及上下兩代文化與認同的轉移與維持（Hebdige, 1979；McLaren, 1994；Willis, 1977）。學習者的先備文化能力大都取決於父母，因此當上一代產生變化時，才會改變下一代身處的文化刺激情境，進而改變下一代既有的文化能力。此種改變卻涉及上一代擁有的經濟、時間與教育方法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的屬性與分工體系（the division of labour）息息相關，而分工體系卻具有高度的穩定性與強制性（Bernstein, 1982；Durkheim, 1933；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致使改變前述限制的空間變得相當有限。此種強制性也無法大幅改變課程內容的知識結構，或許部份原因是受制於資本社會的意識形態（Bowles and Gintis, 1976；Illich, 1973），但是職位階層需求不同層次的知識體系卻是不爭的事實（Davis and Moore, 1966）。儘管如此，教師處於課程與學生之間的中介角色，假若教師能將課程的抽象概念轉化成契合勞工階級學生生活情境特性的內容，則能明顯改善這類學生的學習成效（姜添輝，2005a）。此種轉化涉及教師的文化視野與批判能力，相關研究顯示大部分教師並無此種素養，他們展現工

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思維與行為取向（姜添輝，2003；Apple, 1988, 1990）。工具理性意指關注如何運用相關工具以提升教學效能，進而達成他人預設的教學目標，而非思考「為何是如此」的教育目標、教材內容屬性與教育結果（唐宗清譯，1994）。王渝華（2005）的研究發現顯示，由於教師高度關注如何提升教學效能的工具行為，因而將既有教材內容視為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因而難以藉由批判的途徑，以解析出教材內容與階級權力的關係。

本文據此試圖剖析工具理性的外在成因，這涉及起始訓練、教學屬性、工作場域屬性、國定課程政策等範疇（姜添輝，2002a），由於受限於篇幅，本文將只剖析教師工具理性思維與師資培育課程屬性的關聯性。再者本文採取回溯方式以剖析這兩者的關聯性，這乃基於 R. Dale 所主張的，教育型態與內涵往往反映外在社會情境的屬性（姜添輝譯，2005b）。依據此種論點，本文試圖分析外在社會價值觀的特性以及形成過程，進而檢視此種價值觀與教師工具理性思維的關聯性。關於社會價值觀方面，本文將藉由 K. Marx 的異化（alienation）論點導入，這乃是因為異化指陳資本社會中的主客倒置現象。相關學者並指出，此種現象與科學發展存在密切關係（Lukács, 1971）。因此繼而剖析科學實證主義與社會價值體系的關連性，據以解析此種關聯性對師資培育課程的影響。連結此種課程的教化作用，本文將分析工具理性論存在過度決定論的缺失，以釐清教師能動性（agency）並未消失，只是受到壓抑，並進而建議在師資培育課程中應強化具有文化批判的學科，以擴張教師的文化批判視野，進而開啓上述的能動性。由於本文聚焦於工具理性的負面影響，所以文中剖析的科學實證主義界定於負面的範疇，諸如機械化的因果關係，以及忽視文化歧異的客觀與普遍法則。

## 貳、馬克思的異化說

從主客倒置的角度而言，「工具理性」概念可被視為源自 K. Marx 的異化理論，「異化」

是描繪工業革命導致非人性化情景，亦即人創建的機械化生產模式，原本目的是為人服務，但是最終卻凌駕於人之上，人被迫屈從於非人性的機械化與固定化生產流程，因而產生主客倒置的現象。

Marx 認為資本社會存在勞動力商品化的現象，亦即勞動者以如同商品的勞力與資本家進行交換所得，而且勞動力價值以時間單位進行換算(Marx and Engels, 1970)。致使勞動者失去時間的支配權，在生產勞動過程中，他/她必須屈服於資本家所定的遊戲規則（Thompson, 1966）。馬克思指出上述生產模式導致多重的異化現象。第一是人類物種本性的異化。人的存有意義來自於自我的精神意志，然而資本社會卻排拒甚至摧殘人類物種存有的精神意義。

我們已經見到，資本家不僅必須轉化其金錢到勞動力，並且也須轉化到勞動過程的物質因素……我們發現，勞動者……並非被迫出售一個商品，而是將他本身的勞動力以如同商品的方式進行出售……換句話說，在勞動者眼前的是，所有物質財富如同是商品擁有者的財富，此處所提議的是，他並非工作的擁有者，並且勞動條件如同是異化財產。(Marx, 1976: 1003)

上述引文要點顯示，勞動力商品化使人的精神意志成為可計價與可販售的物。G. Lukács 將此種現象概念化為物化(reification)，「物化」的特點不僅是人屈從於物，更指涉精神意識與勞動力分離的現象，甚至這兩者產生對立關係：

勞動者勞動力與其人格之間的分裂已經變形到物之中，這指的是，他在市場中反覆出售的物。但是所不同的是，並非每一個心智才能皆被機械化所壓抑，而是一種才能（或是才能的綜合體）從人格中分離出，並且被置放到與它相對立的位置，亦即變成一個物，一個商品……

因此關於商品關係轉化成朦朧客觀性的

這件事，並不能因為要滿足人類需求，才將所有物縮減為商品。此種轉化在人的整體意識印上標記，人的特質與能力不再是人格的有機成分，這些特質與能力是人可以擁有，也可以如同外在世界的各種物件是可拋棄的。(Lukács, 1971: 99-100)

此種現象背離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導致人類物種存有的異化，工作淪為如同一般動物生存的手段，而非心物合一的自我精神實踐。

因而勞動目的是人類物種生命的對象化，對他而言，如同在意識上，不再僅僅智力地複製他本身，而是在自己建構的世界中，他主動與在真正知覺上，見到他的自我反射。然而，異化勞動剝奪人的生產目的，也奪走他的物種生命。此種生命是指，他的真正客觀性是如同一個物種的稟性……僅僅如異化勞動將自由與自決的活動轉變為一種工具，如此它將人的種性生活轉變為（維持）肉體存在的工具。(Marx, 1961: 102-3)

第二是勞動伙伴關係的異化。前述勞動力商品化使勞動者處於被資本家壓迫的地位，勞動者原本應互相扶持，但受迫於物慾，致使彼此在勞動市場中互相競爭，甚至處於敵對狀態(Marx, 1961)。再者，物慾與勞動力商品化擴張後逐漸反轉人與物的關係，亦即由使用價值(use value)轉向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後者不再取決於個體的需求，而是商品的形式與外貌，此種轉變使人際的人文價值被物與物的關係所取代。此種主客倒置現象根源於私有財產制度，原本人的價值奠基於內在的精神與人格，這些皆是作為聯繫人際互動與評價的要素，但是私有財產制度大幅貶低人格與精神的意義，內在價值被物質取代，致使財產成為評價人的標準，因而人與人的關係被物與物的關係所取代，所以壓抑私有財產制度足以恢復精神與人格的作用。

這種物質與直接知覺到的私有財產是，異化性人類生活的物質與感官性表現……

## 主題文章

活動與心靈進行表達並確認他們與他人工作做直接的真正聯繫，這些發生在每一個地方，在那裡，社交能力的直接表現根源於從活動內容到心靈的本性……

就如私有財產只是一種事實的感官表現，這指的是在此同時，對自我而言，人是一個客觀事實，並且變成一個異化者與非人性的物件……如此，私有財產的明確壓抑不應被視為，僅在立即與排他性享用的意義，或是只是支配或持有的意義……

所有肉體與心智感覺已被所有這些感覺的單純異化所取代，人類心靈必須被縮減到此種絕對財富，以能夠生產他的全部內在財富，因此壓抑私有財產是完全解放所有人類的品德與理性。(Marx, 1961: 128-32)

第三是生產過程的異化。機械化生產模式具有高度的簡易性與重複性，此種普羅化（proletarianization）足以大幅削減心智活動的運用（姜添輝，2001；Braveman, 1974; Marx, 1976）。因而勞動者喪失既有的人格特質，轉而成爲機械的附屬品，而非處於主宰地位。

由於機器及勞力的廣泛使用，普羅者的工作喪失所有的個人特質。並且接著發生在工人的人格魅力上，他變成生產機器的一個附屬物，而且他所被要求的只是最簡單、最無變化與最容易習得的技術。(Marx and Engels, 1970: 41)

第四是生產結果的異化。產品爲勞動者精神投入的結果，因此產品並非僅僅是單純的物，它是勞動者思想與精神的結晶體。換句話說，產品是勞動藝術的結果，然而勞動者對於這些產品卻無支配權，甚至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產生對立狀態。

勞動者將其生命放置於物體內，但是他現今的生命卻不屬於他本身，而是物體。於是此種活動愈強，勞動者喪失物體愈嚴重……所以此種產品愈多，他喪失本身愈多。存於工作者產品的異化，不僅是勞動力變成一種存於外在

的物體，也是獨立不屬於他所擁有的……其意義是勞動者面對此種物體生活型態，而此種型態就如同是有點敵對與異化。(Marx, 1969a: 97)

此種對立根源於產品數量與勞動力價格無法相容，亦即生產數量愈多，商品價格將愈低廉，因而資本家將會藉由壓低工資的手段，以降低其商品成本，進而提高其商品在市場的競爭力，以及獲取其利潤。上述分析顯示，「異化」現象並不侷限於生產過程或是產品，而發生於整個經濟體系與社會關係之中。

## 參、現代社會的新異化現象

一些學者指出，儘管科技文明大幅改善物質水平，但這並不代表「異化」現象的消失，而是轉向人類的消費行爲中。Marcuse (1964) 指出，人類一直追求更高的物質文明及需求，但此種物質需求卻是一種「虛假需求」，因爲資本家運用各種宣傳手段，將產品塑造成品味、風格與身分的象徵，因而開啓社會大眾的新需求。D. Bell 對此種現象作了下述的評論：

廣告在我們文明的門面打上烙印，它是貨物的標記，新生活型態的榜樣物，也是新價值的預告。如同流行，廣告強調商品的迷人魅力，汽車變成美滿生活的象徵，此種迷人魅力的吸引力無所不在。(Bell, 1976: 68)

此種消費行爲呈現「物質幸福的心靈痛苦」特性，這種痛苦卻往往隱藏於個體的無意識（unconscious）層面，所以廣大社會大眾很難察覺此種潛藏的痛苦。換句話說，個體行爲是思想政治學的產物，透過廣告的媒介，心物之間被重新融合，心物合一促使許多社會成員追逐昂貴的名牌，以滿足虛假的物慾，此種關聯性指向消費行爲是資本意識形態操弄的產物，而非個體主體意識決定的結果（Marcuse, 1964）。因此媒體是促使生產、需求與消費作結合的關鍵催化劑，此種催化作用在於媒體幾乎已化身爲藝術型態，H. Giroux 指出：

當流行文化變成更爲標準化，其企圖不僅

去再製物品，並且也是消耗這些物品的需求，工業化文化達到傳播的新形式已擴張其訊息……現在流行文化的王國幾乎被所有藝術表現的媒體所擴張。(Giroux, 1997:7)

國內的消費風潮亦呈現雷同的特性，瘦身美容公司將醫學技術融入廣告中，以合理化其誇大不實的訴求，致使大部分社會大眾的心靈被蒙蔽，其作用足以重建身體美學的範疇與定義，並且將之連結到個體主體意識與信心。簡言之，瘦代表輕盈、健康、美麗與自信，甚至是女人主體意識的實踐。此種新價值觀足以驅動消費慾望與行為，最終為資本家帶來巨額的經濟利益（吳淑琪，1996；黃瓊慧，1996；張錦華，2000）。表面上，物質擴張能滿足個人需求，但是卻也隱藏許多負面影響。第一：商品化將「人」反轉為創造利益的「物」。商品化的主要意圖是資本利益，因而社會大眾被視為銷售商品的對象，人性被資本體系貶低為創造利益的物件。

媒體雖然致力於推敲大眾的意識或潛意識狀態，但是大眾在媒體的眼中幾乎只被當成物品來計算，為的也只是要向大眾推銷它們的文化商品。(鄭泰承，2000：51)

第二：此種利益導向迫使文化產生世俗化的現象。資本利益的基礎是生產與消費，這兩者原本與文化的高雅性與獨特性格格格不入，但是資本社會能藉由滿足社會大眾品味的意識形態，使文化產生大眾化的結果。其中卻包含高度的庸俗化，個人喜好構成的生活型態竟轉變成藝術。

文化特別是現代文化接收與魔鬼的關係，它不再如同宗教去馴服魔鬼。相反的，世俗文化開始接受與研究此種關係，並且從中作樂。逐漸地，它被視為創造的來源。在爭取美學自主的吶喊聲中，形成的想法是，經驗本身是最高的價值……

如此，現代主義是此種誘惑者，它的力量來自於對自我的盲目崇拜。其吸引力源自某種

想法，亦即生活本身應是一種藝術作品。(Bell, 1976: 19-20)

一些學者宣稱，商品世俗化大幅降低文化作為昇華人類心靈的固有功能，因為文化創作是表達人類內在情感與精神意志的素材，藉此途徑得以昇華人類的精神世界，並能突破社會價值觀的枷鎖，以找回被壓抑的自我意識（Adorno, 1994; Marcuse, 1964）。然而商品化的主要目的是利潤，因此文化的精神作用並不在其考慮範圍，此種商品化不但污穢文化的精神本質，並且藉由文化途徑而產生的人文素養與批判意識也難以維持。Adorno（1994）便抨擊資本社會中的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僅是固定節奏與旋律的組合，這些特性脫離古典樂曲應有的高雅文化內容，以及作為表達內心情感世界，以昇華人類心靈的作用。上述分析同時顯示，文化及休閒的異化與前述工作異化之間存在高度的延續性。

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而言，各種次文化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因而上述論點仍有商榷之地，因為這些學者主要著眼於高階文化，並據此評價其他文化。儘管如此，上述分析指向，消費行為隱藏自我主體與物慾倒置的特性，亦即個體無法自我決定自身需求，而是他人塑造的物慾凌駕自我的主體意識。此種關連性顯示人受困於物。

第三：世俗化並使道德屈從於物質。此種世俗化使個體意識受困於追求物慾的動機中，並且誤認既存現象的合理性，甚至以物質作為判斷精神與道德的基準。

現實就是合理的，不論任何事，已建立的體系符合人們的意向。人們被引導成，在生產體制中尋找思想和行動的有效作用者，而且他們個人的思想與行動能夠，而且必須屈從於此一體制。再者，在此轉換中，此一體制也擔任道德作用者的角色，依靠物化與事物的普遍必然性，良心得到赦免。(Marcuse, 1964: 79)

原本個體主體性奠基於自主的理性意

## 主題文章

識，然而物慾卻使人在物中尋找自我認同。心物之間的倒置使人屈從於物，致使佔有財富的意義超越物的「使用價值」，並成為能力與榮譽的象徵。Veblen (1994) 指出財富的擁有與個人才能的卓越產生密切聯結。在早期社會中，掠奪女人成為證明男性體能力氣的要件，此種佔有權 (possession) 包含個人成就的社會評價。伴隨文明化的推進，特別是工業社會的發展，上述擁有權轉變為財富的累積，財富成為區隔卓越與低劣的指標，因而消費財物變成個體展現財富與炫耀能力的手段。

在文化演化的結果，一個休閒階級的出現恰好與所有權的開始作相合……同樣地，所有權的最早形式是女人的佔有權，此種所有權是被社區中身體強健的男人所佔有的……

財富的擁有賦予榮譽；它是一個容易招致忌妒的區別。沒有任何事物如財物消費是如此的強而有力，對其他任何人而言，取得它也無如此可以想像的驅動力……

所有權的開始階段以單純奪取與轉變的取得階段開始轉進，接續階段是以私人財產為基礎的工業初期組織……然後並不是以成功掠奪的證據來評價擁有，而是在一個社區中，這些財務擁有者是超越其他人的優勢證據……財富變成愈來愈是成功的戰利品……

因此伴隨固定工業的成長，財富擁有得到相對的重要與效能，這些如同是名聲與尊重的風俗基礎。(Veblen, 1994: 10-9)

此種關連性塑造出休閒階級 (leisure class)，他們投入可觀的時間與金錢來模仿貴族階級的生活型態，藉由區隔與一般大眾的差異，進而凸顯其本身的卓越，因而這群人的生活型態展現顯明的金錢競賽 (pecuniary emulation)。諸如雇用一批不從事生產的僕役，以獲取更多的社會榮耀，因為此種做法不但足以證明他擁有雄厚的財力，並且由於不需從事勞動生產足以突顯僕役的優越性，因而能進一步推升其主子的卓越性。

表面上，個體選擇契合自我喜好的物，因而維持自我的主體意志。但在深層面，此種消費行為卻是資本意識形態的產物。Bell (1976) 便指出現代社會企圖藉由大量消費以創造利益，此種企圖卻違背傳統社會的克制慾望精神，藉移植與再造的手段，試圖轉移或是解決此種矛盾現象。具體而言，將清教徒的禁慾精神移植到生產流程中，亦即要求勞動者勤奮與盡忠職守，但是在生活中卻極力鼓吹揮霍性的消費，甚至藉由物品的個性化，以鼓舞人從消費中得到壓抑的解放，甚至追尋自我。由於此種束縛存於「無意識」層面，致使個體很難藉由察覺而得到自我解放。

## 肆、實證科學與工具理性思維

儘管人具有天賦的自由意志，然而外在環境對其發展卻具有更關鍵的影響力。Mead (1934) 便指出，人與外在環境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藉此種互動，個人的自我概念 (self) 才得以發展。然而 Mead 認為在此過程中，社會情境的影響力超過個體的自由度，亦即社會屬性先於個體自我概念。此種論點指向，社會情境內涵對個體意識具有主導性，因而個體主體意識的發展與運作往往涉及外在情境。K. Marx 認為經濟條件在此扮演關鍵角色：

物質生活的生產模式決定，生活中社會、政治與精神過程中的一般特質，並非人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的，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Marx, 1969b: 37)

上述引文顯示，儘管人具有自由意志，但其行為卻受到社會情境所制約。對馬克思主義學者而言，物質在此情境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亦即經濟活動塑造人類之間的社會關係，並且其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決定個體的意識 (Swingewood, 1977; Wolff, 1993)。Tunstall (1973) 的研究發現顯示，漁夫彼此的收入呈現高度相似性，此種屬性不僅影響外在的物理世界，並能建構個體的心理世界。例如他們不僅展現雷同的飲酒習性，並且對其功能的評價

也相當相似。物質條件的差異也塑造出不同社會階級的次文化，Willis（1977）便發現，勞工階級在工作場所發展出大丈夫氣概（masculinity）的次文化。此種文化認同進而影響角色行為的界定，黃淑君（2000）的研究發現顯示，勞工階級認為男性須展現陽剛之氣，女性的特質是溫柔婉約。中產階級對性別行為的界定較為模糊，甚至上述男女性別的特質可互相跨越。

上述論點指陳物質條件足以影響當事者的文化認同甚至社會評價，此種關聯性反映出物慾與社會價值觀存在相當程度的連結。由於科學技術的精進直接左右生產體系的效能與規模，於是透過前述物慾途徑，科學技術能取得大部分社會成員的認可，最後更被視為社會進步的主要甚至唯一原動力。E. Husserl 對此做了下述的評論：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並迷惑于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於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張慶熊譯，1988：5-6）

此種轉變同時改變工作流程、個體思維與社會的運作方式。在工作流程方面：當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被認可後，生產流程轉向泰勒式的管理模式，其特性是客觀、可預測、精確與標準化。表面上，此種模式能提高效能，但也對勞動過程產生嚴密監控。

商品生產一旦獲得科學技術的幫助就如虎添翼……不管用什麼話形容，導致的結果是一樣的，這就是把生產過程中人的獨立性徹底消滅，把生產過程中人的完整形象徹底撕碎，使人成為機器的必不可少的附加物，聽從機器的擺佈；使人成為機器的特殊零（件）部份，任隨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廣應用而隨意沾補。這種狀況的最終結果和表現，就是泰勒制的出現和應用。（宮敬才，1993：71）

關於個體方面：石中英（2001）指出科學知識的出現與發展明顯衝擊精神與宗教形式的形而上學，科技發展導引出高度的物質文明，此種轉變使社會成員關注於實用取向的知識，因而取代原先的精神導向知識。然而獲取物質文明的同時，由於大部分社會成員接納科學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往往內化科學的概念，因而客觀、中立與普遍法則等概念容易成為他們進行思考與行動的主要依據。G. Lukács 亦有雷同的評論：

在近代哲學開始發展之時，知識觀採取普遍的數學形式，它試圖建立一個理性關係的體系，此體系包含一個理性存在的正式可能性、比率與關係之總體性。藉此，任何現象將受制於精確計算……

在這個結果中，他們的一般起源和真正性質是科學概念，通過這些判斷，感覺的複合體被賦予名稱，科學概念在科學中的表現像在社會中的商品一樣……

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認識到，所有人的關係（被視同社會活動的客體）逐漸地採用，自然科學概念體系抽象因素的客體形式和自然規律抽象基礎的客觀形式。並且同樣地，此一行為的主體逐漸採取純粹觀察的態度。（Lukács, 1971: 129-131）

此種情況使社會成員被禁錮於科學知識的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內。

在社會運作方面：個體思維的轉變逐漸重建社會的整體價值觀與信念，此種轉變根源於，科學技術運用於生產體系後產生可觀的成效，進而形成新的邏輯思維，亦即科學管理可免除個體的盲目行動以及其造成的負面作用，同時也可藉此提昇人類的知識，以超越大自然的限制。最後科學數據能構成合理化的思維，並被融入社會價值體系的內涵，甚至可能取代原先人文色彩的精神思維，此種轉移作用使價值的主觀性產生客體化的現象。此種轉移足以影響政治思維，亦即科學技術與概念會被

## 主題文章

引入政治與社會的管理層面 (Marcuse, 1964)。從政府組織運作模式到執行者的思維往往反映上述的機械化定律，所以科學知識的普遍法則與因果關係逐漸轉化成社會管理的規準與政治科學的新思維。此種轉變足以裂解原先社會成員的有機總體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個體被轉化成單一、孤立與可被精確管理的對象。

生產過程的機械式肢解已進入其成分，此種現象也破壞個體之間的連結，過去生產仍處於有機型態之時，生產將個體結合成一個團體。在這方面，機械化也使他們成為孤立化的抽象原子，工作不再將他們作直接與有機的結合。藉由禁錮他們於機械主義之抽象定律之中，機械化變成被媒介到一個獨占性擴張範疇中。(Lukács, 1971: 90)

此種原子化足以產生兩種作用，其一是社會成員難以形成 K. Marx 觀點中的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因而更難以產生集體行動。另一是上述現象使大部份社會成員成為容易擺佈的孤立化個體，因而大幅強化政府的主導權。然而由於顧忌集權與獨裁的負面評價，政府藉由技術專家的仲介，以化解社會的責難，他們能合理化上述主導權的主因是，他們的專門知識被視同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致使科學技術的影響力獲得發展空間。

當工業文化根本的轉化每日生活，科學管理逐漸改變工作的傳統型態……伴隨工作場所與休閒國度的改變是技術專家合法性，它是基於科學與技術的實證主觀點，透過被宣稱無法改變與生產效能，此種形式的理性定義其本身，技術與科學的成長力量成為二十世紀發展的基礎。(Giroux, 1997: 8)

H. Marcuse 將此種技術理性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主導社會思維的現象概念化為單向度 (one-dimensional) 思維：

勞動的科學管理和科學分工大幅提高經濟、政治和文化企業的生產率。結果是 (導致) 較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同時並且基於同樣理

由，此種理性企業製造出心靈與行為的典範，甚至為上述企業的最具破壞性與壓抑性特點作辯護與脫罪，科學技術理性與手法被融合成新型態的社會控制。(Marcuse, 1964: 146)

「單向度思維」不但能削弱公共領域的自主性，並且由於科學發展與生產體系存在密切關係，致使科學服務於資產階級 (Poulantzas, 1979)，因而這群階級可藉由上述的結合，來影響甚至操縱公共領域的運作，這將使公共領域與個人的私密領域不再有明顯的區隔，甚至產生密切的結合。

這麼一個經濟公開上以工具理性的各種技術決定社會裡所有人的經濟生計問題，從後一點看該是公共性的東西，然而它的整個基礎卻是建立在資本家個人的私有財產和物慾之上，從這點看事實上又該是私密領域的東西。(鄭泰承, 2000: 69)

儘管科學世界能披上理性外衣，然而其共同法則卻將理性化約到由數據構成的抽象概念，因而當科學取得主導權時，運作科學理性產生的負面影響之一是，以工具性定義束縛具有多元化的個體思維。這不僅使人文概念的合理性必須對應於抽象數據，並且狹隘的客觀定律主宰人文的主觀意識，並且藉由塑造個體的工具理性思維，科學取得對社會與自然的支配力，因而人的精神意志受制於外在情境的科學定律。

## 伍、工具理性的缺失

在現實情境中，意識是個體行動的最高指導綱領，當實證科學取代個人的自由意志時，行動將陷落於由數據導引出的非人性化條條中。事實上，科學本身隱藏許多缺失，第一：其假設存在先決的預設立場。科學法則往往由數據所構成，然而其處理對象是非情感的物理世界，因而將此種法則運用於人文的情感世界時，不但忽視事物的本質差異性，並且由於支持普遍法則，研究者往往尋求能支持永恆假定的資料，因此普遍原則的成立往往是人為操作



的結果。

藉由消除自我與對象兩者的所有非理性因素，實驗者創造一個人為與抽象的環境，以便在檢驗下，他能夠不受干擾的觀察到不受束縛的運作法則。他盡可能致力於，將他觀察的物質本體縮減到純理性結果，以及數學的可理解數量。(Lukács, 1971: 132)

科學的預設立場也存在形式邏輯的問題，亦即脫離真實社會情境的假設。其中涉及排除差異、矛盾與對立，將自身概念合理化為唯一的選擇，以將與自身對立的事項打入不合理的監牢中。

在形式邏輯的統治下，本質與外貌之間的衝突觀念如果不是無意義的，就是可以消融掉的。物質內容是被中立化，同一性的原則是從矛盾的原則中分離出（矛盾是非正確見解的缺陷），最後原因從邏輯順序中被移除。由於概念完全被界定於他們的範圍與功能之內，概念變成預測與控制的手段……

形式邏輯預示將第二性質化約為首要性質，在其中，第二性質變成物理現象中可測量與可控制的特性。然後，思想要素可以被科學地組織，就如同在社會現實中，人類要素可以被組織，前技術/技術裡性與本體論 / 技術被這些思想要素加以連結，這些要素調節思想法則到控制與支配的法則。(Marcuse, 1964: 137-8)

第二：科學無法確保客觀性。社會現象的成因極為複雜，由於研究者無法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因而擇定有限因素作因果分析，此種選擇往往是研究者喜好的投射，因此科學知識的累積過程夾雜研究者的主觀判斷。

歷史變項與作為支配人們思路的文化特色及概念相一致……然而顯然並非文化科學的研究只能有客觀的結果，在此種意義來說，這些結果僅對某人有效，對其他人則無效，人們所感興趣的是因人而異。換言之，要在無限因果網絡中，對調查目標、範圍或深度的選

擇，是取決於支配調查者與其時代的評價性概念 (Weber, 1949: 84)

第三：科學的發展與運用也無法確保純然的中立性。在工業社會中，科學往往效命於資本利益，因而也喪失本身的中立性，科學成為資產階級增生自我利益與進行社會控制的意識形態 (Poulantzas, 1979)。

資本社會傾向於和科學方法相協調，以真正組織其精確性的社會前提……科學維持特定的形式，在其中，數據資料本身成為科學概念化的充分基礎，當這些數據資料的實際形式是形成科學概念的適當出發點時，它就真正與武斷地站在資本社會的基礎上。它不加批判地接受既有客體的性質，承認該社會的各種規律是科學中不可更改的基礎。(Lukács, 1971: 7)

第四：科學方法忽略個體主觀意義的重要性。行為的產生往往是個體基於外在情境，進行綜合心智判斷的結果，然而科學的運作方式卻背離此種原則，其方法採取純事實導向模式，此種模式忽視主觀意義的重要性。M. Weber 指出行為是個體內在意向 (intention) 的投射，此種意向包含高度的主觀意義，亦即任一事物與個體行為的連結取決於當事者的主觀選擇 (Weber, 1949, 1962)。E. Husserl 也指出意義性的生活世界根源於個體的主觀意識，然而科學的普遍法則卻忽略其重要性：

意識生活是一種進行造就的生活，它造就了存有的意義。這既包括造就被感性地直觀到的存有的意義，也包括造就科學的存有的意義。對於以上這個問題，客觀的科學是從來不予以考慮的。(張慶熊譯, 1988: 108-109)

因而對 M. Weber 而言，以科學的規律原則來評估生活世界的有效性，並無法理解文化內涵的意義，充其量僅捕捉到空洞的外貌：

在精確的自然科學中，法則是重要且有價值的，對於歷史現象的知識，在法則的實體中，由於法則最欠缺內容，所以最具普遍性的法則也是最沒有價值的。當一個詞或範圍的有

## 主題文章

效性更為廣泛時，由於為了涵蓋現象中最大可能數量的共同因素，這將使我們脫離實體的豐富性。法則必須足以盡可能的抽象，因而欠缺內容。在文化科學中，廣泛或是普遍知識的自身是毫無價值。

……科學理想是從經驗實體濃縮成的法則，此種理想是無意義的……因為文化或心理事件較少客觀地受法則支配。(Weber, 1949: 80)

A. Schutz 結合上述 M. Weber 與 E. Husserl 的論點進而主張，社會世界是個體參與建構的產物。個體行動 (action) 包含主觀計畫 (plan) 或方案 (project) 與預見的過程，行為 (act) 則是最後的結果。因此缺乏主觀意念，行為就喪失目的，行動也脫離個體的控制範圍：

在執行一個行為 (act) 時，我們能體驗到相當明確的直接期待，但實際上，這些期待被我們心中的計畫 (plan) 或方案 (project) 所影響……

行動 (action) 貫徹規劃好的行為……

一旦行動啟動，目標便被希望與預想，它被勾勒成彷彿同時包含過去與未來。此種事實能將它思考成以未來完成式作處理……

行動的統整性是由存在方案中的行為所組成，此種型態是經由逐步行動而被瞭解……行動的總體性是主觀的，並且將主觀意義插入恐怕已具備主觀整體舉止 (behavior) 的片段中，(行動的) 結果變成一個虛擬的問題。必須清楚的是，當行動從方案中分離出時，行動是無意義的……

我們指引注意力到自身的經驗上，以便以此方式將他們構成統合的行動。(Schutz, 1997: 61-3)

上述分析指陳個體行為具有特定意向，此種意向的意義根源於個體的主觀思維，因而在行動中，個體會依據由經驗形成的知識庫，據以修正既定的行為計畫。此種關連性指向個體

主觀意識的重要性，它不但是個體行動的燈塔，也是建構多元化人文歷史的根本要素，然而科學定律卻否定此種重要性。

## 陸、師資培訓的技術效能取向與影響

儘管實證科學存在工具理性的缺失，但是伴隨科技文明的推進，實證科學卻持續擴張其影響力，在此過程中，教育體系扮演重要的仲介角色。Schön (1983) 便指出工業革命之後，引發社會大眾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同時造就專業性行業，如醫學與工程學等。這類專業社群不但引介科學知識以處理其事務，並且積極宣揚此種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他們積極介入大學科系的設置以及課程架構，經由高等教育機構的仲介，實證科學的科技理性思維不但獲得正統的地位，並且大幅擴張其影響力：

技術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 是實證主義的遺產，其強大的哲學教條成長於十九世紀……技術理性是事務的實證性知識論，在現代大學中，它變成制度化。當這些大學設立於十九世紀末期之時，實證主義正處於高峰，並且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數十年中，專業學派確保他們在大學的地位……

專業人士將它 (技術理性) 視為，如同以運用新科學，才能達到人類進步的驅動力。(Schön, 1983: 31)

由於這些專業社團享有極高的社經地位，因而成為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標地。此種渲染力在高等教育也快速擴張，因為這類機構能賦予他們合法性專業能力，致使這類機構的課程架構成為其他機構的模仿對象，其目的是晉升到專業社群的俱樂部。然而由於不同學門知識屬性差異過大，因而產生移植的限制，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取向」，亦即學科冠上科學之名。此種科學化並受到社會價值觀所強化，先前已指出科學技術已被社會認可為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科學化課程能符應社會大眾的期望。此種實證科學取向也存於師資培育

課程中：

從國家逐漸支持能力本位的教學體系、教育的行為模式，以及在課程發展與評量的系統理論模式的各種說法，可理解的是理性支配教育理論與實務……此種模式的語言不僅以工業術語概念化教育的性質與功能，並且在需求社會控制形式，以致力於社會同質性與團體順從的前提下，支持行為與目標的模式……歷史紀錄顯示，工業化要求廉價與柔順的勞力，這些要求提供學校的理想工作，亦即以行為的特定價值與標準灌輸移民者。在技術功績理性歷史發展背後的利益是相當清楚的，但是許多教師的培育者卻忘記此種事實。(Giroux, 1981: 150)

上述引文顯示，儘管工具理性主導教育的理論與實務，並且影響師資培育課程的走向與內涵，但是卻甚少有人質疑此種特性。此種工具理性也存在臺灣的師資培育課程中，相關學者指出，台灣的師資培訓課程架構呈現出，高度「工具理性」的實務運用色彩，扣除專門科目之後，專業科目的學分已經不是很多，而且在專業科目架構中，甚少有社會文化議題的相關科目(戴曉霞, 1997)。此種課程項目中充斥數量可觀的技術學科，諸如班級經營、師生關係、親子教育、親師互動、青少年行為與問題、以及教材教法等，這些學科明顯偏向實務運用與教學效能。

我國的師範教育一向偏向採用由心理學所衍生出來的能力本位的典範，重視行為目標、班級經營，有效教學等技術性能力的訓練，教學方法課程也被視為技術的科目。(林彩岫, 2001, I-VII-6)

相反的，得以給予受教者文化視野，並開啓反省批判思維的科目往往處於配角地位，諸如哲學、社會學及相關學科等。更怪異的是，上述技術效能學科也廣受歡迎，此種現象指向供給與消費之間的契合。表面上，此種連結是教師與學生的問題，然而更深層的意義是社會價值觀塑造的產物，因為科學技術塑造出具有

積極迎合心靈的個體。這如 M. Foucault 指出的，有效的支配不在於外在脅迫，而是藉由概念的內化，以使個體主動的迎合：

現在，做戒作用的基礎是教訓、話語、可理解的符號、公共道德的觀念。維繫懲罰儀式的不再是主權權威的可怕復辟，而是符號的活化……法律將特定的罪行與特定的懲罰聯繫起來。只要犯罪發生，懲罰就隨之而來，體現法律的話語，展示既與觀念相聯，又與現實相聯的符號。……

這種明白易懂的教訓，這種重新編碼的儀式，應該盡可能地經常反覆進行。懲罰應該成為一個學校而不是一個節日，成為一本永遠打開的書而不是一種儀式。時間的持續使懲罰對犯人生效，也對觀眾有教益。後者應該能夠隨時查閱這本關於犯罪與懲罰的永久性詞典。(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109-110)

上述師資培育課程難以傳授足夠的文化視野與概念，因而將大部分教師教化成：「狹隘的聚焦於客觀性、效率與技術」(Giroux, 1997: 4)，致使他們容易成為「工具理性」的動物。「工具理性」思維對教師專業造成多重的負面影響。第一是造成大部分教師的普羅化：工具理性使教師專注於如何達成目標的手段與效能，致使他們容易成為執行命令的機器。因而產生執行(implement)與設計(design)的分離作用，此種分離大幅剝奪心智思考的空間，致使教學可能被窄化成實務技術取向，而非價值澄清(Apple, 1988, 1990)。陳志強(2004)的研究發現證實上述的推論，研究證據顯示，教師展現高度的教學關注取向，以捍衛其教學自主權，並且將自身定位於執行者的角色，因而甚少質疑既存教材內容的合理性，其教學思維大多侷限於如何運用更有效的工具與手段，以提升教學效能，而且其相關概念大多源自心理學的範疇，諸如智力、性向與人格等。

第二是此種實務技術導向容易導致教師的心智簡單性：技術效能導向意指依循固定法則的操作程序或模式，此種現象使教師將事務

## 主題文章

背後的複雜因素化約到有限可見的面向，欠缺探索與思考的動機，教學事物轉變為固定性的工作（姜添輝，2001）。長期之後，教師不但對許多教育現象感到冷漠，或是將之視為理所當然，而且也逐漸形成心智的簡單性。

概念簡單性的四種範圍顯示於教師語言是值得做一些評論：(1) 對意外事件的看法是非複雜的。(2) 對教室事件的反應是直覺，而非是理性取向。(3) 面對選擇性的教學事務時，採取非開放胸襟的固執己見立場。(4) 工作定義的狹隘性被歸因於抽象用語。(Jackson, 1968: 144)

此種工具理性思維使大部分教師合理化課程內容的正當性，Althusser (1971) 便發現，絕大部分的法國教師不會質疑，並進而探索存於教育事務中的中上階級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相反的，他們有效的與無意識的執行資本世界給予的任務。國內相關研究也獲致雷同的結論，在教師眼中，專家學者編的課本往往具有高度的可靠性，甚至具有如聖經般的權威地位，因為他們認為教材內容反映社會文化的正當性與必須性（陳志強，2004；陳麗華，1995）。即使有批評也大多侷限於顯而易見的問題，諸如政治意識型態，而非課程內容是否適合勞工階級學童的理解模式（姜添輝，2002b）。

第三是足以塑造出保守文化，並抗拒改革。由於教學場域的封閉性與教學權威賦予教師高度自主權，此種情境與上述心智簡單性足以交織形成教師的保守文化（姜添輝，2002b）。

報酬系統強調心理報酬，其成就標準並不明確，因而強化個人主義取向。教師被加諸曖昧不清的標準，所以他們必須選擇自我喜好的成效指標，此種情況給予教師機會將自身目標、能力及興趣作結合。在解決滿足的平衡上，教師可能抗拒迫使他作改變的因素，如此他擁有可觀的自主權。個人主義意識型態服務於教師的自身目的，在心理報酬上，它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基礎，此種循環是相當緊密的。

(Lortie, 1975: 210)

在此種情境下，教室成為教師的私人國度，自主權一方面允許教師實踐自身的主觀意念，另一方面使教師固守於既有思維，致使阻礙教學方法與策略的創新。由於學生是他們成就的主要來源：

他（教師）對學生進度的知覺如同是他本身成功的非正式指標，有幾位教師提及此種情況宛如是滿足感的重要來源，它提供一個較為增強的情緒性經驗。(Jackson, 1968: 134-5)

因而操弄學生表現隱含教師企圖滿足自身心理需求的動機，而非專業判斷（Leiberman and Miller, 1992）。此種保守性使他們抗拒外來的干預，甚至排斥改變（姜添輝，2000）。

第四是難以改善不均等的教育結果。Dale (2001) 指出教育被賦予救贖與解放（redemptive/ emancipatory）的功能，亦即企圖藉由教育途徑，以改善勞工階級下一代向上流動的情形，因而學校教育被視為具有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的功能。由於技術效能容易使大部分教師聚焦於教學結果，致使學習成效被化約到輸出與輸入的簡單連結，此種關連性使他們大幅忽略甚至排除其中的複雜因素。實際上，學習表現往往取決於學童既有文化能力是否契合課程內容的知識結構，此種能力大都是特定社會情境的產物。Bernstein (1996) 以情境導向類型分析學生的理解能力，他認為特定類型與家長的社會階級背景存在產生關連性，勞工階級孩童大都呈現情境束縛（context-bound）的理解模式，亦即當學習事物的屬性相近於實際生活經驗時，才有學習成效。中上階級學童則呈現非情境束縛（uncontext-bound），亦即他們的理解模式超脫具體經驗的束縛，同時從其中抽繹出，掌握事物背後的抽象概念、邏輯關係與原理法則。

……分類將關連於每日家庭生活……分類原則對於一個特定地方性的物質基礎有相對的直接關係……中產階級孩童的分類模式

原則是相對獨立於特定情境，然而勞工階級孩童的分類模式原則是依賴於特定情境。(Bernstein, 1982: 308-9)

由於忽視社會文化的影響，致使教師「以果斷因」，亦即以學生的學習表現作為解釋為何如此的依據，此種解釋往往侷限於心理學的範疇，諸如學生的智力、動機與情緒等（姜添輝，2003）。

好孩童是用功的、服從的與柔順的，絕大部份勞工階級學生像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相對缺乏秩序與規訓的訓練。在智力成就上，他們缺乏興趣。在家中，他們缺乏順從學校要求的增強物。(Cohen, 1971: 115)

此種主觀與刻板印象進而使大部分教師傾向於喜好成績優秀的學生，而非致力於如何改善成績差的學生。在此種倒果為因的思維下，這類教師難以發覺造成不均等教育結果的社會文化因素，致使此種不均等現象將持續存在。

## 柒、評論與結語

Marx 認為資本社會存在，人的精神意志屈從於物的象徵意義，此種主客倒置的異化現象逆轉人與物的主從關係，亦即從使用價值轉向交換價值。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異化現象並未隨物質文明的推進而消失，只是化身於消費行為中，因為資本家運用宣傳等手段重塑人的虛假需求，人也誤認其合理性，致使異化被轉化成無意識狀態。

此種新異化與科學技術的精進有關，因為科學技術直接影響生產規模與效能，受到物慾的影響，大部分社會成員認可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此種轉變使科學邏輯概念成為許多人對外界的認識觀，客觀、中立與普遍法則等科學概念充斥於個體的思維中，致使規律與效能逐漸被導入社會管理的模式中。歸結而言，當科學技術取得不可取代的地位後，社會成員內化實證科學的工具理性思維。

工具理性存在許多缺失，這乃源自實證科學的假定，證實普遍法則存在排除差異的預設立場，由於事務原本存在差異性，所以排除此種特性意味脫離真實的社會情境。求證普遍法則依賴因果關係的檢證，然而此種檢證包藏實驗者對相關因素的主觀選擇，致使危及科學的客觀性。由於科學技術效命於生產體系，科學也喪失中立性。客觀與中立使科學否定情感的重要性，然而任一事物與個體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乃基於內在情感衍生的意向，因而從行動到行為，主觀意義是驅動個體意向的根基。

在科學擴張影響力的過程中，大學機構扮演關鍵性中介角色，醫學與工程等專業科系成為其他科系的模仿對象，以試圖晉升到專業社群俱樂部。師資培育課程的科學化隱含此種意圖，此種情境能塑造出工具理性取向的教師，他們關注達成他人預設的目標，教育的目的、內容、學習過程與結果容易被化約到純技術面，因而大幅壓抑思考與探索的動機。此種情況容易造成教師的心智簡單性，教學場域的封閉性與自主權使心智簡單性轉變成保守性，因而阻礙教學方法與策略的創新，並抗拒外界的要求與革新。心智簡單性使許多教師將複雜的教育問題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往往採取以果斷因的心理學方式，並據以合理化高低不等的學生學習表現，此種技術效能取向忽視或低估社會文化對不均等教育結果的影響。

儘管教師的技術效能導向行為確實存在，但是文中學者的批評仍有商榷餘地，因為他們將工具理性思維過渡推論到教師的行為上。此種缺失根源於文中已分析的一系列假定，諸如商品化導致使用價值轉向交換價值、消費行為包藏無意識的異化、以及科學技術的非人性化導向等。固然消費行為存在相當程度的交換價值現象，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並無絕對的切割線，伴隨物質文明的推進，過去屬於交換價值的物品卻能轉向使用價值的層次。例如在早期社會中，轎車是炫耀財富與能力的工具，但商品普及後，迫使大部分種類的轎車大眾化，因而大幅壓縮上述的象徵意

## 主題文章

義。上述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切割也指涉心物之間的分離，此種純粹二分法往往背離社會情境，商品傳遞的訊息往往包容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意義。例如藝術品不只是物的價格，也具有文化的精神意義。因此物品足以產生心物合一的作用，此種現象根源於人的需求性與情感性，前者牽涉理性思維擇取的生活功能，後者指涉感性世界的人文關懷，這兩者交織構成多元化的個體生活世界。

再者，文中學者將消費行為的異化預設為無意識狀態，此種假定的缺失就如同前文已論述過的，科學存在預設立場，這類學者可能以排除及選擇的方式，證實此種潛意識的預設立場。此種假定也純然否定人的能動性，如此人成為屈從商品的消費機械。事實上，大眾能以「挑選」的方式，以消費特定而非所有同一類型的商品。例如觀看電視節目往往取決於當事者的主觀意念，此種選擇指向內在情感與意向的主導性。即使能證明無意識的存在，但其影響卻仍有高估之虞，商品消費或許存在此種無意識的成分，但其總體的影響卻不見得有如此大。例如大部分社會成員皆有附和流行樂曲或時尚的行為，但此種附和往往僅是總體生活的一小部分。

儘管這類學者仍認為這僅是以變化商品種類的手段，來誘使個體進行消費，然而這兩者的契合卻存在「調和」過程，亦即更新與變化產品的主因是刺激消費，因而商品是否能提升生活的舒適性與功能性，將是刺激消費的關鍵點，這使得人取得選擇的主導權，而非僅是逆來順受的消費機器。此種現象迫使商品必須關注生活舒適性，舒適性與功能性往往存在密切的關連性，功能性大多無法脫離生活的運用性與需求性，因此消費物品乃是個體基於實際需求進行判斷的結果，所以商品本身具有本質性的功能，只是資本社會基於銷售利益，過渡擴大此種功能，這種渲染足以契合個體的虛假需求，因而消費行為同時包容異化與主動選擇的特性。上述商品功能與生活需求的結合迫使商品走向人性化的發展，由於科學技術服務於

生產體系，因此科學也將產生人性化的轉變，這指向人與科學的互動性，而非僅是科學單向支配人。

上述分析指陳，工具理性理論存在過渡推論的缺失，此種武斷推論純然否定個體的主體性，而且也低估個體的能動性，亦即與外界互動的主動性。固然如同前文指出的，在教學事務上，許多教師展現顯明的技術效能行為，但是主體性卻未完全消失，因為他們仍對教學現場的複雜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以「選擇」自認適當的教學策略與方法，只是這種「選擇」大多侷限於，如何達成他人預設目標的範疇，因此這種擇定包含「意向」與「無意識」的雙重意義，意向擇定是個體主動判斷的活動，而且判斷是依教學的屬性與需求，進行心智活動的結果，諸如依據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採取教學策略與方法。然而此種有意向的擇定是既存工具理性思維的投射物，諸如大部分教師忽視或低估文化差異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此種契合使教師不再質疑社會價值觀的正當性，理所當然使他們「無意識」的屈從於既存思維。由此而言，教師的能動性只停留於上述技術性的選擇與行動，但卻受到於外在社會思維的箝制。因此能動性並未真正消失，只是受到外在價值觀的壓抑，解除此種壓抑將能擴張教師的文化視野與思維，其關鍵點是喚醒個體主體思維，以產生能動性。從社會化的角度而言，師資教育對教師思維產生極大的影響。前文分析顯示師資培育課程存在工具理性的現象，因而容易塑造出著重教學效能的教師，因而若能在此種課程中強化文化批判的科目，將能改善上述缺失。此種轉變能使教師理解文化差異與學習表現的關連性，具體而言，既存課程知識內涵並無法契合勞工階級的生活經驗、文化內涵與思維模式，假若教師能掌握此種關聯性，將能進而發展出可行的改善方案。

## 參考文獻

- 王渝華 (2005)。國小教師工作的異化現象與成因。台南市：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 石中英 (2001)。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北京市：教育科學出版社。
- 吳淑琪 (1996)。解讀報紙瘦身廣告之女性意涵。台北市：私立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學系學士論文 (未出版)。
- 林彩岫 (2001)。師範教育的課程與教學之社會學分析。載於國立中正大學 (主編)：課程與教學論壇 (論文集)，未出版。
- 林湘慧 (2003)。家庭社會空間與兒童習性關聯性之研究。台南市：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 姜添輝 (2000)。教師專業意識、影響性、社會控制與實質內涵。教育與社會研究，創刊號，頁 1-24。
- 姜添輝 (2001)。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普羅化論點及在教師專業與階級意識的意義。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33-58。
- 姜添輝 (2002a)。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批判教育社會學的分析。台北：高等教育。
- 姜添輝 (2002b)。九年一貫課程政策影響教師專業自主權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8(2)，157-198。
- 姜添輝 (2003)。教師是專業或是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文化再製理論的檢證。教育研究集刊，49 (4)，97-131。
- 姜添輝 (2005a)。B. Bernstein 的理論以及在教學上的運用。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主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 (pp.215--251)。高雄：復文。
- 姜添輝譯 (2005b) (R. Dale 著)。全球化：作為比較教育的一個新世界？載於楊深坑主編。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 (pp. 85-106)。台北市：高教。
- 唐宗清譯 (1994) (K. Harris 著)。教師與階級。台北：桂冠。
- 宮敬才 (1993)。盧卡奇的哲學思想。台北市：唐山。
- 馬信行 (1997)。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中教育與職業資料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5，29-66。
- 張慶熊譯 (1988) (E. Husserl 著)。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
- 張錦華 (2000)。1982 至 1999 台灣瘦身廣告研究---多面向的研究。廣告學研究，15，67-114。
- 陳志強 (2004)。文化再製過程中教師教育信念的成因與影響之分析。台南市：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珊華 (2004)。小學生文化資本之累積與作用。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 主題文章

(未出版)

- 陳麗如 (2003)。國民小學學生家庭背景、家庭資源與學業成就之關係研究。彰化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麗華 (1995)。實習教師的社會科教學推理 -- 結構與意識的辯證。台北市：師苑。
- 黃淑君 (2000)。社會階級與青少年性別世界之建構---以台北都會區兩所國中為例。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文(未出版)。
- 黃瓊慧 (1996)。解讀電視廣告中的女性意涵---以美體瘦身廣告為例。台北市：私立銘傳管理學院大眾傳播學系學士論文(未出版)。
- 楊瑩 (1994)。教育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台北市：師苑。
-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M. Foucault 著)。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 鄭泰承 (2000)。科技、理性與自由。台北市：桂冠。
- 駱明慶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 戴曉霞 (1997)。文化研究與教育研究。載於歐用生 (主編)。新世紀的教育發展(pp. 355-374)。台北市：師苑。
- 謝孟穎 (2002)。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Adorno, T.W. (1994). On Popular Music.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pp. 202-214). N.Y.: Harvester Wheatsheaf.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LB.
- Apple, M.W. (1988). Work, Class and Teaching. In J. Ozga (ed.). *Schoolwork: Approaches to the Labour Process of Teaching* (pp. 99-115).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pple, M.W. (1990).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Y.: Routledge.
- Ball, S.J., Bowe, R. and Gewirtz, S. (1997). Circuits of Schooling: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in Social-Class Context. In A.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and A.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Y.: Basic Books.
- Bernstein, B. (1961). Social Class and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In A.H. Halsey, J. Floud and C.A. Anderson (eds.).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pp. 288-314). N.Y.: The Free Press.



- Bernstein, B. (1982) . Code, Mod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 Model. In M. Apple (ed.) .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Essays on Clas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pp. 304-355) . London: RKP.
- Bernstein, B. (1990) .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Bernstein, B. (1996) .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Bourdieu, P. (1993) .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C. (1977) .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76) .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raveman, H. (1974) .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Y.: Monthly Review.
- Cohen, A.K. (1971) . *Delinquent Boy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 Dale, R. (2001) . Shaping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over Half-century. In J. Demaine (ed.)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day*. N.Y. Palgrave.
- Davis, K. and Moore, W.E. (1966) .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In R. Bendix and M. Lipset (eds.) . *Class, Status, and Power* ( pp. 47-52)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urkheim, E. (1933) .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Y.: The Free Press.
- Giroux, H.A. (1981) . *Ideology,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iroux, H.A. (1997) .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Hope: Theory, Culture, and Schooling*. Oxford: Westview Press.
- Goldthorpe, J.H. and Breen, R. (1999) . Class Inequality and Meritocracy: A Critique of Saunders and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1, 1-27.
- Goldthorpe, J.H., Llewellyn, C. and Payne, C. (2<sup>nd</sup> ed.) (1987) .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 Hebdige, D. (1979) .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N.Y.: Methuen.
- Illich, I. (1973) . *Deschooling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Jackson, P.W. (1968) . *Life in Classroom*.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Lieberman, A. and Miller, L. (1992) . *Teachers - Their World and Their Work*. N. 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Lortie, D.C. (1975)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主題文章

- Lukács, G. (1971)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in.
- Marcuse, H. (1964) .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 Marx, K. (1961)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E. Fromm (ed.) . *Marx' s Concpet of Man*. N.Y.: Frederick Ungar.
- Marx, K. (1969a) . Alienated Labour. in T. Burns (ed.). *Industrial Man (pp. 95-109)* . London: Penguin.
- Marx, K.(1969b). Technology as the Prime Mover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 Burns(ed. ). *Industrial Man (pp. 35-42)* . London: Penguin.
- Marx, K. (1976) . *Capital ( volume one )* . Middlesex: Penguin.
- Marx, K. and Engels, F. (1970) .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cLaren, P. (1994) . *Life in Schools*. (second edition) N.Y.: Longman.
- Poulantzas, N. (1979) .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LB.
- Schön, D. (1983) .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Y.: Basic Books.
- Schutz, A. (6<sup>th</sup> paperback printing, 1972, 1<sup>st</sup> paperback printing) (1997) .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wingewood, A.(1977). *Marx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Thompson, E.P.(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Y.: Vintage.
- Tunstall, J. (1973) . Work and the Social Life of Fishermen. In P. Worsley (ed.) . *Modern Sociology (pp. 239-244)* . London: Penguin.
- Veblen, T. (1994) .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Y.: Dover.
- Weber, M. (1949) .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Y.: Free.
- Weber, M. (1962) . *Basic Concepts in Sociology*. N.W. : Philosophical Library.
- Wells, C.G. (1985) .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Pre-School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s, C.G. (1987) . *The Meaning Makers: Children Learning Language and Using Language to Lear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Willis, P. (1977) .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olff, J. (2<sup>nd</sup> ed.) (1993) .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London: Macmillan.

# **The Critique of Marxism a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Its Reflections on Teacher Education**

**Tien-Hui Chiang**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s on students' performances, the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results has consistently remained. Improving this phenomenon requires an open vision and critical mind o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s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urriculum contents. However, it was argued that most teachers did not possess such a vision or mind. Their minds were generally confined within the scop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refore, their behaviour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techno-effectiveness orientatio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acro-level factors molding such simple minds. The argument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suggest that this phenomenon was rooted in social value system. W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productive system was proofed, positivism commenced to expend its influence and, was finally fused into social value system.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e assumptions of positivism, such as neutrality and generalization, tend to dominate the individual's mind and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This scientific movement makes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focus on the scop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echno-effectiveness. Such a curriculum is much likely to mold its takers a simple mind as witnessed by the fact that in terms of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goals, teaching materials, processes and results, most teachers tend to be instrumental-rational oriented.

Keywords: Marxis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eacher educati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主題文章